

经济重心由效率转向弹性，谁来买单？

后新自由主义时代下，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力量平衡将向后者倾斜，而西方政治人士希望企业能为此买单。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财富再分配的新时代吗？还是说，作为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史特征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衡将继续存在？

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因为通胀正在肆虐，中期选举也即将来临。

3年多前，有专栏中指出，我们将离开从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的财富积累时代，进入一个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力量平衡将在一定程度上

向后者倾斜的新时代。

撇开英国新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不谈(她似乎想让世界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我认为我们终于踏入了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权力失衡最为明显的美国。

在许多经合组织(OECD)国家,过去 40 年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出现了脱钩,在此期间,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增长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然而,尽管西欧 55%的生产率增长收益仍然归于劳动者,但美国劳动者却不得不为区区 14%的收益而相互争抢,而且这些收益的大部分都归于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劳动者。

去全球化正在开始改变这种格局,它将有利于某些行业的本土劳动力市场。人口老龄化也是如此,它将创造一个结构上更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护理行业的数百万个新的在岸工作机会。

然而,资本-劳动力故事的第三部分是,在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巩固消费者和国家的地位。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之一是经济重心从效率转向了弹性。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在寻求减轻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和市场变化对它们的影响。供应链、储备货币分配和财政政策的变化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经济弹性需要资金。

问题是，谁来买单？

政府希望企业承担部分负担。在七国集团(G7)成员国寻求遏制不断攀升的天然气和电力成本之际，不妨思考一下有关能源和电力行业价格控制的讨论。欧盟(EU)希望在非天然气电力生产商的市场价格超过一定门槛时，对其征收暴利税。

今年 8 月，美国国会(US Congress)将处方药价格控制写入了预算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也有人在敦促所有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设置一个价格底线（这在美国很反常，因为工会化通常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发生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刚刚签署了一项法案，可能从明年开始将快餐行业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22 美元。就连亲商的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也主张，企业应该拿出更多资金，帮助支付员工培训和儿童保育费用。

乔·拜登以劳动力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也有着巨大的推动力，这是上周在洛杉矶举行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的首要 and 中心议题。一些国家安全官员渴望与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文莱等国达成新协议，以增进美国为加强其在亚洲的经济和安全力量基础以对抗中国的努力。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希望确保国内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不受影响，罗莎·德劳罗、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等进步人士也这么认为。他们和 42 名众议院民主党人上周致信拜登政府，要求提高亚洲贸易谈判的透明度，以免成为逐底竞争。

正如戴琪对我说的那样：“在平衡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方面，有很多东西在发挥作用。”但在她看来，新的贸易协议绝不能削减美国劳动力的工资、降低环境标准、以及允许跨国公司避税或锁定垄断权力。她表示：“这关乎自下而上、从中产出发来建设经济。”

戴琪只主导贸易谈判。例如，更同情大型科技企业的美国商务部负责有关供应链、基础设施和税收的谈判。安全鹰派人士对美国企业界提出的“越大越好”的论点表示同情。

但在秋季中期选举之前，民主党人做任何会严重影响劳动力前景的事情都是愚蠢的。重新夺回工薪阶层的支持对保持国会多数席位至关重要。研究表明，民主党失去了过去 20 年里新自由贸易政策掏空的工业城镇（比如我长大的那个地方），这是唐纳德·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拜登总统一直同情劳工利益，其任命的关键人员，比如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莉娜·汗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加里·根斯勒等都将这一点作

为他们的核心使命。但要想让“回报工作、而非酬谢财富” (Reward work, not wealth)的口号真正有意义，民主党人需要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如果他们真的获胜，那么资本与劳动力的力量平衡将进一步转变。